

# 明清小说文本形态生成与演变研究

陈才训 著



陈才训著  
明清小说文本形态生成与演变研究

# 明清小说文本形态生成与演变研究

陈才训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小说文本形态生成与演变研究 / 陈才训著.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5325-8753-7

I. ①明… II. ①陈… III. ①古典小说—小说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 ①I207.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36655 号

## 明清小说文本形态生成与演变研究

陈才训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l@guji.com.cn](mailto:gujil@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http://www.ewen.co)

浙江临安曙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4.375 插页 2 字数 323,000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300

ISBN 978-7-5325-8753-7

---

I · 3254 定价: 5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 目 录

绪论 .....	1
<b>第一章 作者与明清小说文本形态 .....</b>	<b>17</b>
一、作者炫才心态与小说文本形态 .....	18
二、“著书者之笔”与小说文本形态 .....	38
三、作者主体抒发意识与小说文本形态 .....	53
四、作者与小说“副文本” .....	93
<b>第二章 评点者与明清小说文本形态 .....</b>	<b>106</b>
一、批注与正文界限的模糊性 .....	109
二、作为“第二作者”的评点者 .....	118
三、作为“副文本”的评点形态 .....	177
四、作为评点者的作者与书坊主 .....	1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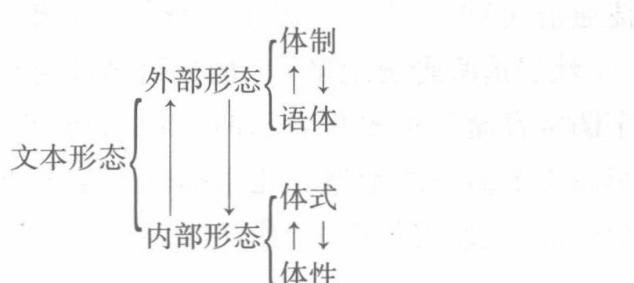
<b>第三章 书坊主与明清小说文本形态</b>	204
一、书坊主对小说文本的加工	205
二、书坊主作伪与小说文本形态	236
三、书坊主编创小说之文本形态	251
四、书坊主与小说“副文本”	284
<b>第四章 编选者与明清小说文本形态</b>	296
一、编选者对小说文本的加工改造	296
二、编选者与小说“副文本”	309
<b>第五章 读者与明清小说文本形态</b>	318
一、作者的读者意识与悬念设置	319
二、读者与作者的文本通俗化策略	341
三、读者与晚近翻译小说文本形态	356
四、读者对小说文本形态其他方面的影响	372
<b>第六章 作为“副文本”的明清小说插图</b>	385
一、明清小说插图出现的原因	386
二、明清小说插图形态的形成	398
三、文人清赏清玩之风与插图形态	418
<b>结语</b>	436
<b>参考文献</b>	450
<b>后记</b>	454

明清小说文本形态由内在形态与外在形态两个层面构成,它既包括情节文字,还包括情节之外的种类繁多的“副文本”。明清小说文本形态的两个层面是密切相关的,它们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从整体上说,明清小说文本形态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就其内部而言,又可以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层面,即外部形态与内部形态。

## 绪 论

明清小说文本形态由内在形态与外在形态两个层面构成,它们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从整体上说,明清小说文本形态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就其内部而言,又可以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层面,即外部形态与内部形态。

明清小说文本形态由体制、语体、体式、体性四个层次构成。体制指小说文本的外在形态、面貌及附于其上的诸如评点、插图、凡例、识语、序跋、读法、题词、题署等名目不一的“副文本”,语体指小说文本的语言系统、语言修辞和语言风格,体式指小说文本的艺术表现方式,体性指小说文本的表现对象和审美精神。明清小说文本形态是上述要素在相互作用中形成的和谐的、相对稳定地蕴含着丰富文学与文化意蕴的审美规范(见下图)。



简言之,明清小说文本形态由内在形态与外在形态两个层面构成,它既包括情节文字,还包括情节之外的种类繁多的

“副文本”。因为，明清时期，多数小说既是精神产品又是文化商品，小说作者、评者、刊刻者、编选者、插图者、读者等因素都会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不同程度地介入小说文本，从而影响、制约着小说文本形态的生成与演变。具体说来，作者的创作心态及小说观必然会影响到小说文本形态；评点者融评、改于一体的批评特色，编选者融选、改于一体的编选特色，都使他们在评点或编选中对小说文本形态加以增删改易，由此他们便成为小说真正意义上的“第二作者”；以牟利为动机的书坊主在刊刻小说时也往往对其文本形态予以加工改造；作为小说文本的接受者，读者的鉴赏心理也往往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小说作者、书坊主、评点者、编选者、插图者，促使他们通过特定的文本形态来满足其审美需求。也就是说，明清小说在创作及传播过程中其文本形态往往是由多人共同塑成的。

其实，明清小说文本题署所透露的信息，也表明作者、评者、书坊主、编选者、插图者乃至读者共同塑成了小说文本形态。如万历间周曰校万卷楼刊《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署“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明书林周曰校梓行”，同时还注明“上元泉水王希尧写”、“白下魏少峰刻”；万历间佳丽书林重镌本《新刻全像音诠征播奏捷通俗演义》署“九一居主人撰”、“清虚居吉瞻仙客考正”、“巫峡岩道听野史纪略”、“栖真斋名衢逸狂演义”、“凌云阁镇宇儒生音诠”，可见作者、评点者、书坊主、刻绘者等都参与了小说文本形态的塑造。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抄本《于少保萃忠传》之题署信息更为详尽具体：

卷一 西湖沈士俨幼英父纂述 武林沈士修奇英父批评

卷二 钱塘孙高亮明卿父纂述 横李沈国元飞仲父批评

卷三	西湖沈士俨幼英父辑著	虎林沈士俊孟英父批评
卷四	钱塘孙高亮明卿父编辑	携李沈国元飞仲父批评
卷五	西湖沈士俨幼英甫纂著	虎林沈肇森六弭甫批评
卷六	西湖沈士俨幼英父纂述	虎林凌萃征聚吉甫批评
卷七	西湖沈士俨幼英甫纂著	虎林沈肇森六弭甫批评
卷八	西湖沈士俨幼英甫纂著	虎林沈肇森六弭甫批评
卷九	西湖沈士俨幼英父辑著	虎林沈懋允大生父批评
卷十	西湖沈士俨幼英甫纂著	虎林沈肇森六弭甫批评

由题署信息看,作为作者或评点者的沈士俨、沈士修、孙高亮、沈国元、沈士俊、沈肇森、凌萃征、沈懋允都参与了小说文本形态的塑造。清代小说如乾隆间德华堂藏板《雪月梅》署“镜湖逸叟陈朗晓山编辑”、“介山居士董孟汾月岩评释”、“颍上散人邵松年鹤巢校定”;嘉庆间文道堂藏板《绣像岭南逸史》题“花溪逸士编次”、“醉园狂客评点”,“琢斋张器也、竹园张锡光同参校”。晚清民初,从小说题署信息看其文本形态仍成于众人之手,如光绪间乐善堂刊本《金钟传》题“正一子、克明子著”,“后学鬲津天香居士正定注解”,“津门培一批”,“鬲津静一居士、超凡居士录”,“鬲津水斋校”;光绪间吴趼人《电术奇谈》署“日本菊池幽芳氏原著”、“东莞方庆周译述”、“我佛山人衍义”、“知新室主人评点”。需要强调的是,除少数伪托之作,大部分明清小说题署信息并非虚言,其文本形态确是题署者集体合作的产物,如康熙刻本《赛花铃》题“白云道人编次”、“南湖烟水散人校阅”、“黄顺吉刻”,作为“校阅”者的烟水散人的确对小说文本形态的生成起到了实质性作用,因为小说封面“识语”称小说曾经“烟水散人删补校阅”,附于小说文本的风月盟主“后序”及烟水散人本人“题词”,也称烟水散人对小说“严加

校阅,增补至十六回,更觉面目一新”<sup>①</sup>,这说明烟水散人实际上也是小说作者之一,并非徒有虚名。同时,出现于这部小说中的众多圈点与插图则表明刻绘者黄顺吉也是小说文本形态的制作者。

为充分认识明清小说文本形态的丰富内涵,有必要对“副文本”这一概念予以简要说明。“副文本”由热拉尔·热奈特在其《广义文本之导论》《隐迹稿本》等著作中首次提出,其后他在《副文本:阐释的门槛》一书中对“副文本”内涵和外延做出更为明确的阐释:“副文本如标题、副标题、互联型标题;前言、跋、告读者、前边的话等;插图;请予刊登类插页、磁带、护封以及其它许多附属标志,包括作者亲笔留下的还有他人留下的标志,它们为文本提供了一种(变化的)氛围,有时甚至提供了一种官方或半官方的评论,最单纯的、对外围知识最不感兴趣的读者难以像他想象的或宣称的那样总是轻而易举地占有上述材料……它大概是作品实用方面,即作品影响读者方面的优越区域之一……草稿、各种梗概和提纲等‘前文本’形式,也可以发挥副文本的功能。”<sup>②</sup>弗兰克·埃夫拉尔对“副文本”的诠释更为简洁明确:“副文本指围绕在作品文本周围的元素:标题、副标题、序、跋、题词、插图、图画、封面。”<sup>③</sup>概而言之,“副文本”主要相对于小说情节文字而言,即正文之外的其他元素一般都可视为“副文本”。明清小说“副文本”种类繁多,名目不一,其中有的出于作者之手,但大部分出于评点者、书坊主、刻绘者、作者友人或其他身份不一的读者,如康熙钓璜轩本《女

① 白云道人《赛花铃》,《古本小说集成》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63页。

② 热拉尔·热奈特《热奈特论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71页。

③ 弗兰克·埃夫拉尔《杂闻与文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

《仙外史》卷首有作者“自叙”、“自跋”以及“江西南安郡守陈奕禧香泉序言”、“江西廉使刘廷玑在园品题二十则”、“江西学使杨颙念亭评论七则”、“广州府太守叶敷南田跋语”，正文则附有多达六十余人的评点文字。

更重要的是，正因明清小说文本形态并非成于一时一地一人之手，所以从创作与传播两个环节看，它始终处于变动之中，而这正是导致明清小说文本形态演变的根本原因。

有的小说在创作过程中往往经作者几易其稿，正所谓“一部小说数十回，其全体结构，首尾相应，煞费苦心，故前此作者，往往几经易稿，始得一称意之作”<sup>①</sup>。缘于此，同一部小说因先后流传于世而产生了不同版本并呈现出不同的文本形态。例如，曹雪芹曾对《红楼梦》“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由此造成这部小说不同版本之间在文本形态上出现诸多差异，如很多版本第三十四回都写宝钗获知宝玉挨打与其兄薛蟠有关，于是她心里想道：“当日为一个秦钟，还闹得天翻地覆，自然如今比先又更厉害了。”然而，甲戌本、庚辰本、己卯本、程甲本、程乙本等都未写到薛蟠为秦钟“闹得天翻地覆”之事，只有舒元炜序本第九回结尾与诸本有别：

贾瑞只要暂息此事，又悄悄的劝金荣说：“俗语说的，光棍不吃眼前亏。咱们如今少不得委曲着赔个不是，然后再寻主意报仇。不然，弄出事来，道是你起端，也得干净。”金荣听了有理，方忍气含愧的，来与秦钟磕了一个头，方罢了。贾瑞遂立意要去调拨薛蟠来报仇，与金荣计议已定。一时散学，各自回家。不知他怎么去调拨薛蟠？

---

<sup>①</sup> 梁启超《〈新小说〉第一号》，《新民丛报》第 20 号《绍介新著》，1902 年。

且看下回分解。<sup>①</sup>

照此推测,接下来的第十回应是贾瑞挑唆薛蟠大闹学堂,可这一情节并没有得到落实,原因应是曹雪芹在对小说“增删五次”的过程中将这一情节删除了;而他对上述第三十四回宝钗的这段心理描写却并未做出相应修改,因此才使得情节不够严密<sup>②</sup>。再如,邹弢与沪上名妓汪瑗生情,他以此为素材而创作了长达五十二章的《海上尘天影》;其后邹弢赴湘游幕,返沪后汪瑗已从良嫁人,于是作者遂将原书删改而续至六十章,并改名《断肠碑》。对此,王韬《海上尘天影序》有所说明:“始只五十二章,名《尘天影》,兹因女史之嫁,将五十二章悉行删改,又续增数章,改名《断肠碑》。”<sup>③</sup>显然,由《海上尘天影》到《断肠碑》,小说文本形态变化很大。《孽海花》成书时间长,因多人合作而反复修改,其文本形态也处于“流动”中。光绪二十九年(1903),金松岑创作《孽海花》前六回。光绪三十一年(1905)金松岑将所作前六回交给曾朴,二人共同商定六十个回目,曾朴又拟定《孽海花》人物名单,计划按“旧学时代”、“甲午时代”、“政变时代”、“庚子时代”、“革新时代”、“海外运动”六个阶段来全面反映晚清社会。接着曾朴对前六回予以修订,并续写成二十回。光绪三十三年(1907)《小说林》创刊,曾朴又续写了五回,即第二十一至二十五回,其后中断写作。1927年,曾朴开始修改《孽海花》,主要是对前六回和第二十五

① 曹雪芹《舒元炜序本红楼梦》,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900页。

② 参见刘世德《解破了〈红楼梦〉的一个谜——初谈舒本的重要价值》,《红楼梦学刊》1990年第2辑。

③ 司香旧尉《海上尘天影》,《古本小说集成》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回进行修改,如略去了所列的六十个回目,删除了反对科举制度、封建君主制度以及陈千秋主张以“霹雳手段”推翻清廷的激进言辞,摒弃了第二十五回有关下层百姓要求抗日卫国的故事,将第四、第五回有关兴中会的革命活动移至第二十九回;增加了龚自珍与太清西林春、龚孝琪与褚爱林、曹公坊与李霞芬、刘永福与花哥等人的艳情故事;并续写至第三十五回<sup>①</sup>。有的小说家对自己旧作的修改力度更大,甚至以一种全新的文体予以重写,如徐枕亚《玉梨魂》深受读者喜爱,于是他又将其改写为日记体小说《雪鸿泪史》,称“是书主旨,在矫正《玉梨魂》之误,就其事而易其文,一为小说,一为日记,作法截然不同”,“书中人物,悉仍《玉梨魂》原本,间有加入者。情节较《玉梨魂》增加十之三四,诗词书札,较《玉梨魂》增加十之五六。两书抵牾处,附注评语,以清眉目”<sup>②</sup>。由此看来,作者对原著情节文字多所增删,并附以新的“副文本”,其文本形态变化之大不言而喻。

经作者写定的明清小说文本,在接下来的传播过程中也会随着评点者、书坊主、编选者、刻绘者、读者等因素的介入而不断发生变化。无论是世代累积型作品还是文人独创型作品,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在传播过程中都形成了不同版本系统,而且有的小说还有繁本与简本之分,这体现的正是小说文本形态的流动性。对此,郑振铎先生曾指出,中国古代小说多“集体的创作”,在其传播过程中“有的人加进了一点,有的人润改了一点”,许多作品“已经经过了无数人的传述与修改了”,它是“流动性的,随

<sup>①</sup> 参见《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889页。

<sup>②</sup> 徐枕亚《〈雪鸿泪史〉例言》,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26页。

时可以被修正,被改样”<sup>①</sup>。以《三国演义》为例,梦藏道人在该书遗香堂刊本序中称“罗贯中书遭一剞劂即遭一改窜”<sup>②</sup>,这恰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三国演义》文本形态变迁的原因。如目前所见最早的嘉靖壬午本为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无图,卷首有庸愚子序、修髯子引,没有评点;随着文本的流动,后出版本的文本形态则更为丰富,如吴观明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乃合二则为一回,回目即为两则标题,有单面插图一百二十幅,有眉批和总评,卷首依次为秃子序、缪尊素序、无名氏序、读三国史答问、宗寮姓氏。即使同为嘉靖间刊本,嘉靖壬午本与叶逢春本的文本形态也不相同。除情节差异外,还有诸多不同:叶逢春本每卷卷首注明故事起讫时间,而嘉靖壬午本没有;叶逢春本插增了四十余首静轩诗,而嘉靖壬午本则没有;叶逢春本开篇有“一从混沌分天地”七古一首,嘉靖壬午本没有;嘉靖壬午本中有尹直《名相赞》,叶逢春本没有。可以说从目前所见最早的嘉靖壬午本到最流行的定本即毛评本,《三国演义》的文本形态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再如,《西游记》现存最早刊本为万历二十年金陵世德堂刊《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而其他明刊本如杨闽斋本《新镌全像西游记传》、李卓吾评本《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闽斋堂本《新刻增补批评全像西游记》、杨致和本《新镌唐三藏出身全传》、朱鼎臣本《鼎镌全相唐三藏西游传》等多由世德堂本节略、删改而来,它们情节存在差异,其中最明显的是只有朱鼎臣本有江流儿故事;及至清代,《西游记》刊本主要有《西游证道书》《西游真诠》《新说西游记》《西游原旨》《通易西游正旨》《西游记评注》等,虽各

①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页。

②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3页。

自情节内容都有出入,但它们都有江流儿故事,而且都是评点本。

不止以上几部名著,实际上大部分明清小说在传播过程中都会伴随着文本形态的变迁,也就是说明清小说文本往往以“动态”为常态,在一定历史阶段内总是变动不居的。如余邵鱼《列国志传》之后出现了余象斗重刊八卷本《列国志传》、托名陈继儒评点十二卷本《列国志传》、托名李卓吾评点《片璧列国志》及冯梦龙《新列国志》、蔡元放评点本《东周列国志》、杨庸《列国志辑要》。它们虽在情节上大同小异,但在文本形态上却各有差异。如冯梦龙对《列国志传》进行大幅修订,由八卷二十八万字扩展至一百零八回共七十余万字,但删除了从武王伐纣至西周衰亡的情节内容,主要叙述自周宣王三十九年至秦始皇二十六年之间的历史故事。蔡元放评定本《东周列国志》为二十三卷一百零八回,它对原本错讹的史实、地名、人名、时代均加以改正,删除虚构成分,对此他在该书《读法》中做出说明:“大率是靠《左传》作底本,而以《国语》《战国策》《吴越春秋》等书足之,又将司马氏《史记》杂采补入。”“《列国志》中,谬误甚多,如《左传》《史记》俱言宋襄夫人王姬欲通公子鲍而不可,旧本乃谓其竟已通了。又说‘国人好而不知其恶’,此事关系甚大,故不得不为正之。”<sup>①</sup>正是蔡元放“足之”、“补入”、“正之”之类的文本加工改造,才导致了小说文本形态的变迁。再如熊大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四种主要版本的文本形态各不相同,第一种是嘉靖间杨氏清白堂刊本,全称《新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八卷七十四则,附《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后集》、凡例七则、图像三十幅,第一幅为岳王像,卷一

<sup>①</sup> 蔡元放修订《东周列国志》,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题《新刊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其他七卷题为《新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序题作《武穆王演义》，卷首有熊大木序，所附《精忠录》三卷；该书万历间周氏万卷楼刊本，八卷八十则，嵌图式，题“王少淮写”，卷首有熊大木序，所附《精忠录》两卷。第二种是万历间余氏三台馆刊本，改题“红雪山人余应鳌编”，名为《新刊按鉴演义全像大宋中兴岳王传》，八卷，上图下文，序改署三台馆主人，实为熊大木序，未附《精忠录》。第三种是崇祯间友益斋刊本《岳武穆尽忠报国传》，出于于华玉之手，此乃熊大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删节本，它合并卷则，改题标目，删除了原本中一些“繁芜”的细枝末节和那些怪诞不经的“鄙野齐东”之处。第四种是《新镌全像武穆精忠传》，它包括多个文本形态各异的版本，如聚盛堂刊本题“吉水邹元标撰”，实为熊大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删节本，六卷六十八回，改编者将原本七字单句则目改为七字对句回目；在合并情节的同时保留了于华玉认为“鄙野齐东”的荒诞之说如风僧冥报之类故事情节，删除了按语和史评。可见，同一部小说在传播过程中因版本差异会呈现出各不相同的文本形态。有的小说在传播过程中即使情节未被修改，也会有许多“副文本”被不断植入，如《镜花缘》嘉庆二十三年苏州原刻本无图，有许乔林序、洪棣元序及孙吉昌等六家题辞；道光元年刊本，除保留许乔林与洪棣元之序外，题辞则增至十四家；道光八年芥子园本除原有序及题辞外，又增加麦大鹏《镜花缘绣像序》、谢叶梅序及其画像一百零八幅，这表明《镜花缘》的文本形态在传播过程中是不断丰富的。

与其他小说相比，同一题材系列小说文本形态的流动性更为显著。不妨以“包公案”系列小说、明代开国题材系列小说、济公题材系列小说为例加以说明。先看“包公案”系列小说。

最初有人将石玉昆说唱“包公案”故事记录下来成为《龙图公案》唱本；又有人将《龙图公案》中唱词略去，淡化其说书口吻，将其改成长篇章回体制，一些与全书关系不大的情节也被删去，最后整理成《龙图耳录》，谢蓝斋抄本《龙图耳录》卷首称“今将此书（《龙图公案》）翻旧出新，不但删去异端邪说之事，另具一番慧妙，却又攒出惊天动地之文”<sup>①</sup>；同治间问竹主人等修订《龙图耳录》，“将此书翻旧出新，添长补短，删去邪说之事，改出正大之文，极赞忠烈之臣、侠义之士”<sup>②</sup>，以《忠烈侠义传》即《三侠五义》之名刊行。其后，俞樾认为《三侠五义》“第一回叙述狸猫换太子事，殊涉不经。白家老妪之谈，未足入黄车使者之录。余因为别撰第一回，援据正史，订正俗说，改头换面，耳目一新”<sup>③</sup>，即他将《三侠五义》第一回《设阴谋临产换太子，奋侠义替死救皇娘》改为《据正史翻龙图公案，借包公领侠义全书》。他又将艾虎、智化、沈仲元与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蕙合称七侠，由此《三侠五义》便变成了《七侠五义》。可见“包公案”故事大致沿着《龙图公案》—《龙图耳录》—《三侠五义》—《七侠五义》这样的轨迹演变，而在文本流动过程中，最初的包公断案故事中增入了侠士行侠锄奸之类情节内容，由此导致公案小说与侠义小说合流。由以上分析看，鲁迅认为《三侠五义》“草创或出一人，润色则由众手”<sup>④</sup>，确为的论。《皇明英烈传》《皇明开运英武传》《云合奇踪》皆叙明朝开国之事，它们在情节上大同小异，由此小说文本的流动

① 石玉昆等《龙图耳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页。

② 问竹主人《忠烈侠义传序》，石玉昆述《忠烈侠义传》，《古本小说丛刊》第29辑，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05页。

③ 俞樾《重编七侠五义传序》，石玉昆述《七侠五义》，《古本小说集成》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④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01页。

性得以显示。日本日光晃山慈眼堂藏明刻本《皇明英烈传》卷首小序称该书“因旧本而修饬之，补其所遗，文其所陋，正其所讹集以成编”<sup>①</sup>；同时，卷一《太祖皇濠州应瑞，刘伯温青田出身》在叙事过程中特意注明“按原本《英烈传》”云云，这表明在《英烈传》之前已有“原本《英烈传》”流传。万历间金陵杨明峰刊《皇明开运英武传》卷一《撒敦设计害忠良，脱脱被谗服鸩酒》注称“按旧本《英烈传》，脱脱又遭哈刺答率兵攻破淮安”<sup>②</sup>，这表明该书参照了“旧本《英烈传》”；而且该书在旧本基础上新增了一些情节，并以“附增”二字标明，如卷一《太祖皇濠州应瑞，刘伯温青田出身》回目前即注明“增附”二字。《云合奇踪》应是在剪裁《皇明英烈传》或《皇明开运英武传》基础上而来，如其第四十三则有批语云：“此一则事节段落详悉，胜《英烈传》多矣。”<sup>③</sup>这里所谓《英烈传》应也指“原本”或“旧本”《英烈传》。由以上信息可以推断，《皇明英烈传》《皇明开运英武传》与《云合奇踪》三者皆出于“旧本”或谓“原本”《英烈传》，而它们文本形态上的差异性正是由其“旧本”或谓“原本”的流动性所致。再看济公题材系列小说文本形态的变迁，隆庆间四香高斋刊本《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卷首有济颠绣像一副、无竟斋赞渔隐文一篇；而天启间刊本则易名为《济颠罗汉净慈寺显圣记》，还删除了卷首的济颠小像，并将“无竟斋赞语”移至书末；崇祯间刊本又易名为《济颠语录》。特别是收入《三教偶拈》的《济颠罗汉净慈寺显圣记》又经冯梦龙增删改易，如隆庆间四香高斋本《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

① 《皇明英烈传》，《古本小说集成》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② 《皇明开运英武传》，《古本小说集成》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

③ 徐渭编《云合奇踪》，《古本小说集成》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92页。